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八九期 ——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5a)

【史海钩沉】杨尚昆离开中南海——初读《杨尚昆日记》(节选)	高 华
【史料整理】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	王年一
【五洲震荡】文化大革命中的外国造反派	寒 山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八)	周孜仁
【学术探讨】毛泽东留有遗嘱吗?	胡 平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杨尚昆离开中南海——初读《杨尚昆日记》(节选)

• 高 华 •

◇ 离开中南海前夕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单。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

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

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行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 杨尚昆与周恩来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

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3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份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 杨尚昆与朱德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

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与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 在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日子里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与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他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四五个月以后。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12年。

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22日又被正式免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次日，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西北、华北、东北的任何基层。

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中央批准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但是，杨在山西还没有来得及工作，1966年7月3日，就失去人身自由，遭到“隔离审查”，此时距杨抵达太原仅一个月。不久杨又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前后长达9年时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起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

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

# 【史料整理】

## 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

• 王年一 •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曾有一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兵团”，其成员就是“五·一六分子”，简称“五·一六”。从1967年“清查五·一六”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五·一六”一直是被坚决打击的对象。被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有关资料较多，难以分类。现开列如下，供大家研究时参考。

（一）1978年11月21日，原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吴庆彤，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专门谈了“五·一六”问题。吴庆彤说：

首先是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认为是有的，在北京有。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不清楚。证据是：1967年8月初，“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北京散发了恶毒攻击周总理的传单。8月9日还将这些反革命传单张贴在北京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和西四丁字街等处。……这些反革命传单的署名是“首都516红卫兵团”。这些传单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无耻的诬蔑和攻击，群众看了十分气愤，纷纷揭发“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有的将反革命传单拍照下来，有的从墙上搞下来，送给周总理和国务院。现在国务院的档案里还保存着这些反革命罪证。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揭露过“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所以，有些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后天打倒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朱德、陈云这些老同志都要打倒。后来才晓得主要就是他们搞的。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1967年8月，7、8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5月16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同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4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国务院各部门在清查中也发现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如学部的吴传启、林杰，外交部姚登山，国家经委的陈大伦，国务院财办的何畏等人。这些坏家伙都直接同王、关、戚挂勾，受王、关、戚的指挥。现在看来，后台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林彪反党集团。

吴庆彤又说：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中斗争非常复杂。中央文革一伙和林彪反党集团惯于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大耍贼喊捉贼的伎俩，对清查“五·一六”进行破坏。陈伯达竟然当上了

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组长。他们胡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是“五·一六”后台，他们在全国全军普遍清查“五·一六”。林彪提出“一个不漏”。陈伯达提出追组织，找加入“五·一六”的登记表。吴法宪说“北京的小三军就是‘五·一六’”（引者注：“小三军”就是当时与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所谓“冲派”。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多数派的“大三军”比较而言，人数较少的“冲派”就是“小三军”）。他们千方百计地转移斗争方向。这样，在清查“五·一六”中，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伤害了很多好同志，还整死了不少好人。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和林彪反党集团，故意把清查“五·一六”引向邪路，搞扩大化，把水搅浑，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在毛主席指出王、关、戚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中央文革一伙不得不将王、关、戚关起来。但是，在清查“五·一六”中，不少单位要求通过王、关、戚弄清本单位“五·一六”分子的情况，中央文革一伙人又规定要经过姚文元批准，结果是不许向王、关、戚作调查。

（二）1967年8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增刊）刊出《北京出现一股反周总理的逆流》。报导说：

8月8日深夜，“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分别在北海公园前后门、王府井大街北头一个胡同里、西四、平安里、动物园、商学院等处贴出了6种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反动大字报。他们同时还在师大等处散发了同样内容的传单。所谓“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7月中旬出现的，跨行业的秘密组织，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

（三）1967年9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小报第4621号刊登《公安部有关人员谈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一些情况》。其中有公安部“五·一六兵团”专案组负责人孙茂祥和北京卫戍区的杨增祥向记者介绍的调查、审讯“五·一六兵团”头头供认的情况：

#### 1、关于“五·一六兵团”活动情况，原文为：

经中央批准，已拘留入狱审讯的有：钢院学生张坚（建）旗、李芳（女）、陈力（女），商学院学生程镇华，101中学学生郭海燕（女）、长沙一中学生唐亦安。还有与该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冶金部矿冶研究院的物资组成室副主任蔡萍迹（女）和她的母亲曾广澜。

“五·一六”兵团是7月1日正式出现的，有一个“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可以证明，会在北外开的，发起者有钢院的张建旗、李连菊、李芳、陈力和101中学的郭海燕。

前身是钢院的“五·一六”。张等均是钢院的“五·一六”分子（属钢院造反公社红一团），在对外作战部工作（原文如此——引者注）。据交代，5月份在反击二月逆流活动中，张建旗最先提出揪二月黑风总后台，矛头指向周总理。并说：“从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天起，就准备坐牢。你们过了三个月再看。”不久，张写了一封攻击周总理的万言书《致总理的公开信》，4月上旬，送林副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张到处向社会上观察哪里有反总理思潮的人，积极串连师大苏东海、商学院程镇华以及农大、北外、二外等有反总理思潮的人。

《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张建旗一方面提出所谓“要掀起深入揭发高潮”和“抓新的一小撮”，另一方面派李连菊和北外“六·一六”进行反革命串连。

5月下旬，北外“六·一六”派张新民、戴达明等5人到钢院找张建旗等人。5月29日，张建旗、李连菊等人就搬到北外活动。由北外××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住宿，只留曾先锋、李良弼、杨阳等在钢院活动。曾先锋是钢院的负责人，并担任“第一线指挥”，张建旗在北外担任“第二线指挥”。

5月底6月初，张建旗及其同伙成立了所谓“钢院五·一六兵团”，发表了一个反革命的宣言。他们还把《致总理的公开信》抄成了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同时他们自己还写了一些欢呼的大字报，这样又勾引来一个郭海燕（去年到鞍山大串连时认识张建旗的），她写了《为一张反动大字报叫好》的大字报，署名“群众的呼声”。“钢院五·一六兵团”成立以后，还向毛主席、中央文革等写过信，信中希望中央文革在6月4日前给以指示，如不给指示，就按自己的分析行动。

6月3日，中央首长严肃地批评了北外、二外反总理的活动，引起了张建旗等人的混乱。张等7人在紫竹院讨论了一两天，意见不一致，一种认为反总理不符合毛主席战略部署，要搞只在业余时间搞，另一种意见坚持搞下去。之后，李良弼、曾先锋、杨阳回钢院，张建旗、李芳、陈力、李连菊和郭海燕等5人继续到处收集攻击周总理的黑材料。

6月30日—7月1日，在张建旗倡议下开会两天，张提出用整风方法搞了“两忆”（忆“受迫害”、“受压迫”之苦）、“三查”（“查斗志”、“查阶级”即查动摇性、“查工作”）。这样，他们又鼓了劲，起草了一个反革命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因为101中的郭海燕参加了，就由“钢院五·一六兵团”改为“首都五·一六兵团”。

.....

这一时期，他们还串连了商学院程镇华、农大郭树忠、师大苏东海、长沙一中唐亦安以及财办何畏等人。

7月份以来，张等频繁活动。方针是：“影射攻击不点名”。这时，程镇华、唐亦安等也参加了活动。

7月3日—5日深夜，张及其同伙在财贸口贴出“枪毙××”、“打倒李先念”等大标语。

7月5日，程镇华透露李先念要在人大会堂做检查，他们把准备好的传单印了1000份，在人大会堂散会后散发。

7月11日—12日，经过串连后，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农口和八机部。一是到八机部门口刷大标语，一是与农大东方红“五·一六兵团”配合，到农口各部门口大量散发《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

7月13日—14日，他们到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等地贴出“吴克华是好同志”、“肖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三军打成打砸抢派没有好下场”等大标语。

7月份，张等经秘密串连，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7月15日，由张建旗、刘令凯发起，在北外“六·一六”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主要研究是否要搞总理，以及如何搞法。参加者约20人左右。其中有三中卢平化（化名×东兵），二外张广武、欧阳江，农大周明灯、崔碧君等。

7月29日，他们又开秘密会议。.....

由于唐亦安、郭海燕等4人贴了攻击总理的大标语，被革命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公安部门，张建旗及其同伙在8月3日—8月4日开了两个晚上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一，积极准备写、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和传单，公开贴出和散发。二，扩大组织，统一行动，成立所谓“八个方

面军”。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写了7种传单，约印了4000份，并抄写了13份大字报。

8月9日凌晨，他们把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公开贴在北京街头，并向北京大专院校，以及湘、鄂、粤、新疆等地邮寄传单。他们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这是他们活动的高潮，也是最后一次。

8月11日，江青等中央首长宣布“五·一六兵团”是阴谋的反革命组织以后，该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迅速土崩瓦解……但是张建旗等6—7人，仍在负隅顽抗。……

8月17日，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抓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8月25日，就把“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了。

## 2、“五·一六兵团”成员情况。

孙茂祥对记者说，从目前调查、审讯犯人口供情况来看，判断是否“五·一六”成员，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大致可分三类：一类，头头和骨干，了解内幕，一起参加活动者有张建旗等20人；二类，有相同观点，和骨干分子一起抄写大字报，刷大标语，散发传单等活动者共24人；三类，被骨干头头串连过的学生、干部，并表示支持赞同，提供了黑材料的共21人。

## 3、“五·一六兵团”后台问题。

财办××组组长何畏，7级干部，6月20日，何与张建旗、郭海燕谈过话，表示对总理一不是奴隶，二不畏惧。

“五·一六”的活动还有一些，清查“五·一六”也还有些情况，补充如下：

1967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铁一连”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一集）刊登《看，黑手操纵下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介）》，其中说：“6月30日和7月1日两晚，经过充分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主楼5楼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1967年5月27日，中央在一个内部文件上说：“炮打周总理的歪风逐日增长，革命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表态。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红旗造反团’和二外‘首都红卫兵’中一部份人为代表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不断高涨，调子不断升高。”

1967年1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小报第5633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这份材料说：“一些单位已有扩大化。”它又列举了种种表现。

1967年8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关于“首都5·16红卫兵团”问题调查简报》第4号刊出《“5·16”——蔡萍绩——徐向前》。8月25日，戚本禹在简报上批：“即送江青同志阅。‘5·16’与徐向前、康克清以及军队有关。”同日，江青批：“总理、康生、伯达、富治同志参阅。”（1979年12月16日，戚本禹写的交代材料说：“关于徐老总……我现在记得有一个‘5·16’后台的调查就涉及到他。这件事还向江青等送过简报。所谓‘涉及’指的是某一个可疑人物同徐老总认识或有来往。”）

（四）“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铁一连’”1967年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一集）（油印）收有《看，黑手操纵下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介）》一文，其中说：

“1968年1月5日，北外‘×××兵团’在天安门前贴出反革命大字报《×××你要干什么》，公然进行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活动”。

“钢院张建旗跳出来攻击×××是‘毛主席的同路人’，‘与李××、李××、余××、谷×是第三司令部的人’，‘运动以来与中央文革讲话不一致’等等。”

“4月×日，张建旗到学部请示吴传启，讯问他的炮打×××的大字报何时可贴，吴说时候未到，没让他贴。”

“6月2日，张建旗等人在外院密令，准备公布炮打×××的材料，会上成立了‘北钢五·一六红卫兵团’，即‘首都五·一六兵团’的前身。”

“6月3日，张建旗贴出《给×××的一封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污蔑×××是二月黑风的后台，煽动人们起来‘造反’。同一天，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出现署名‘北钢五·一六兵团’的极端反动的传单《23个为什么》。”

“6月30日和7月1日两晚，经过充份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主楼5楼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所谓‘代表大会决议’，提出‘×××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主将’，是‘反革命两面派’。”

“7月12日，在八机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中央气象台等单位散发了传单《告农林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个为什么》等，诬蔑×××是二月黑风的后台，反动之极。”

“7月30日夜，商院‘决战纵队’在阜成门贴出《首都五·一六兵团政治部、作战部严正声明》，要总理公开检查。真是猖狂！”

“8月11日，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严正指出‘五·一六兵团’是秘密组织，阴谋组织。”

“‘五·一六’一些成员名单：……。”

“‘五·一六’后台：农口秦化龙、外交部陈家康、红旗杂志林杰。”

“‘五·一六’组织系统：有政治部、作战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及8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农林口。二方面军：财贸口。三方面军：文教口。四方面军：工交口。五方面军：军事口。六方面军：中学口。七方面军：外事口。八方面军：全国通讯联络。”

（五）“首都红代会部份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于1967年9—10月编写成《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铅印本，共153页，内部发行），这个大事记中零散地记录了一些有关“五·一六”的材料，或可补以上资料的缺失。摘录如下：

1967年“三月中下旬在反击‘二月逆流’的剧烈的复杂的斗争中，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集团——王力、关锋、林杰之流初露头角。其干将吴传启、洪涛等人开始相互串连。他们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说什么“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总理司令部”，“现在的斗争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是旧政府的人，不用听他的”。“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是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以生产压革命”，等等。

“……在这个阴谋集团的策划下，3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贴出了许多恶毒攻击李富春、李先念的大字报，轰打周总理的逆流从此时隐时现。”

1967年“五月初，钢院张建旗等一伙，积极策划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活动。农大出现了‘五·一六兵团’”。“在二外，以张光武为首的一小撮公开发表‘开炮声明’，在商学院跳出了一个‘火线纵队’，迫不及待地把矛头针对周总理，并暗地策划建立反革命‘五·一六兵团’。”

1967年“5月16日，一个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小集团北外‘六·一六’抛出反动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恶毒诬蔑周总理是‘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反革命“首都5·16兵团”的前身——“钢院5·16兵团”成立。

6月2日，反革命小丑张建旗抛出他两个月前（3月31日）写的大毒草《给周总理的一封信》，并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攻击周总理。

6月14日，北外“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和钢院“五·一六”头目张建旗等人密谋后，在北外“六·一六”成立了“首都5·16兵团”。……钢院、二外、商院等地不时出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许多革命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迎头痛击反总理的逆流。

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5月29日，陈伯达等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核心组严肃指出：……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月3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再次向北外“六·一六”提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

张建旗一小撮见势不妙，于4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作退却，并倒打一耙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并作了重要指示。伯达同志指出：……‘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1967年“6月30日至7月2日，反革命阴谋小集团‘首都五·一六兵团’在外语学院5楼召开了所谓‘第一届代表大会’。……7月上半月，“五·一六”黑匪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开始所谓‘第一个战役’、‘第二个战役’，大肆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反动传单。污蔑周总理‘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在八机部贴出反动标语‘打倒六月黑总后台’，大肆攻击周总理。”

1967年“7月14日‘五·一六兵团’猖狂活动。7月14日在首都大街上及农口各局、各院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

1967年“8月9日反革命‘五·一六兵团’在夜间贴出许多大标语，恶毒地攻击周总理。……”

1967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开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革命组织座谈会。……首长还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8月11日，商学院斗争了‘五·一六’黑匪干将程镇华。”

1967年“8月17日黑匪兵团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擒获。8月18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76个革命组织发表严正声明，决心与黑匪兵团决一死战……8月20日，黑匪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归案。师大井冈山揪出黑匪干将陈力。8月25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乔卫东’组织里的黑匪‘五·一六兵团’干将季××等9人，缴获手枪两支、子弹百余发以及大批反革命材料。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奋起反击‘五·一六兵团’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

兵’，抄出大批黑材料。8月26日，首都及全国在京革命派1000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5个黑匪头目被揪出示众。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编辑部编的《教育革命》第20期（1967年9月13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主席、中央首长谈“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全文如下：

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批判。——毛主席最近指示

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摘自9月3日《人民日报》

还有个“五·一六”，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陈伯达同志8月11日讲话

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同志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陈伯达同志9月1日讲话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叫“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污蔑“五·一六”。——康生同志8月11日讲话

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康生同志8月27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康生同志9月1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明天（指8月9日）要出×××的大字报，我想找你们谈一谈，这件事要大动的。文革小组开会谈到要找几个学校办一办这个事情。“五·一六红卫兵团”第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建旗，是钢院的。——谢（富治）副总理8月8日讲话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像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

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江青同志 8 月 11 日讲话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从“左”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江青同志 9 月 1 日讲话

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社会上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特务。有这些黑手藏在背后，以极“左”或极右面貌，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不允许，注定要失败的。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个东西，叫“五·一六”，它人不多，表面上多数是青年人，这青年人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利用青年人思想不稳定。

“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出现，我们每个人材料他们都整了，我们也不怕，心里没鬼怕什么？

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二月份有一股风。目前是一股“左”的风，以极“左”面目反总理。

要提高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千方百计要作垂死挣扎，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识别他，向群众宣传，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是见不得人的一小撮。

有人要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这要提醒同志们注意。——江青同志 9 月 5 日接见安徽代表讲话

现在有用极“左”的口号，打倒一切，分裂和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这一篇文章（指姚文无的文章）的要害，是点破了目前出现的“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有人企图用形“左”实右，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陶铸的那一套，妄图分裂中央，分裂毛主席的司令部，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有些人就上了当。“五·一六”的青年上当了，要反戈一击。“五·一六”的黑手是一小撮，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戚本禹同志 9 月 6 日讲话

在当时铺天盖地针对“五·一六”的批判中，上述只是摘引了一部份中央首长的谈话，并且所引或背景交待不清，或摘引不全面。根据本人掌握的资料，下面对以上引文作一些解释或补充。

1967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1967年9月2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导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1967年9月5日，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江青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又说：“目前这股子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康生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象北京‘5·16’中的一小撮，还有什么‘星星之火’，实际上是阴谋小集团，他企图动摇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破坏已经批准的革命委员会。”

“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1967年9月13日印发的《文化大革命关键时刻中央首长十分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铅印）收有《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时间：1967年9月5日晚9点10分至次日凌晨零点25分。“中央首长”为：康生、李富

春、江青、姚文元、李天佑、曹轶欧等。江青在讲话中说：“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说它是‘东西’，就因为他是反动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人数不多，这个表面上也是年青人（引者注：语言不通，原文如此）。这些年青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象‘五·一六’，反对中央，或者以极‘左’的面目来反总理，这是很典型的，是反革命组织。”

1967年9月1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江青“九·五”讲话的通知》。

1967年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革命群众组织”“认真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的录音，“进行学习”。

196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九·五”指示〉的通知》，文件注明“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张贴”。

1967年9月16日晚，“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部份代表时，周总理说：“9月1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康生、江青同志都指出‘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反动的阴谋组织。姚文元同志在文章中指出了它的性质。”“对待‘五·一六兵团’，不要扩大化，只是几个坏头头嘛！”“千万不要扩大化”。“听说五·一六有八个方面军，名字很吓人，其实只有几十个人。”“你们哪个组织，哪个学校有‘五·一六’……由学校组织内部自己解决，不要别的组织去捉。”“我们要防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我们，一定要批判极‘左’思潮。”

1967年10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第4975号说：“10月18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

1968年12月17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幌幌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人？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谢富治问：“有什么证据没有？”陈伟回答：“没有证据。”陈伯达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1968年1月24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纪登奎等接见中央直属宣传队和解放军代表、样板团和北影、新影的领导同志时，周恩来、江青讲话，他们讲了三大问题：（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

吴法宪交代：“1967年7—8月，江青一伙诬蔑周总理保护老师、副总理、国务院的部

长、各省委书记，是保护了‘走资派’，是‘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同中央文革分庭抗礼’。要周总理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和国务院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为中心，代替党中央集中领导文化大革命。”“1968年5月，江青还多次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谢富治等人秘密开会，诽谤周总理‘在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掌握方针、原则性差’。”

（七）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用3个版面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他加了一些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份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八）严家其、高皋二人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最新增订版，香港潮流出版社出版）中有《清查所谓“五·一六”》一节，其中对“清查五·一六”扩大化，有一些论述具有参考价值，不妨摘引如下：

其实，在“坚决镇压”了“五·一六兵团”之后，所谓“五·一六”已不复存在了。谢富治说过，“五·一六兵团”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五十人，而且，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江青在讲话中，姚文元在文章中，所以对“五·一六”如此大张挞伐，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所谓“右的和极‘左’的”，所谓“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幕后”、“操纵者”，都没有具体的指向。因此，一切对“毛主席司令部”（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和林彪），对军队中林彪支持的人，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笼统地称作“五·一六”分子。实际上，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属于“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人”、“掌握军队大权的人”，只要觉得“你反我”，就可以用“五·一六”这个代名词给人以定罪。

……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文化大革命”中各类受过冲击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一遍。从“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演化出来的“五·一六问题”，是一个含义不清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都可以牵扯到“五·一六问题”所包括的内容中，这就难免有人就“五·一六”问题纠缠不清。一九六八年，在北京以至全国，“五·一六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中央还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各单位先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因为曾经有过“五·一六兵团”，因此，认为“五·一六”是一个广大的组织。追查登记表、追查组织网首先提上了清查“五·一六”的日程。然而，追呀追呀，越追组织问题越模糊。由于绝对不肯否定“五·一六”的存在，于是提出，组织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罪行，要从清罪行入手。然而，清呀清呀，越清越清不出头绪，于是又重提清组织问题。就这样，清查“五·一六”，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由于普

遍存在着逼供信，“五·一六”的问题也就越清越大了。一九七〇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林彪、江青，亦步亦趋。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很多单位还把林彪1月24日的讲话摘成语录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不少单位的高音喇叭在播音时间里总是不停地重复播放着。……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也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所谓“五·一六”问题严重的人，不仅被单独隔离，不准回家，还必须不断地交待“罪行”，接受批判斗争，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洗刷自己“肮脏的灵魂”。在这样一种森严壁垒的环境中，在不停地叫喊不要逼供信，但事事处处又都存在着逼供信的气氛中，有的人不堪忍受这种极度痛苦的精神折磨而走上了绝路。

清查“五·一六”在漫无边际地行进着。中国大陆大多数地方都抓出了不少“五·一六”。在“文化大革命”中活跃过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接下去的便是写不完的交待，认不清的罪。不过一百五、六十人的东方歌舞团，一开始就抓出了“五·一六”分子五、六十人，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清查运动，使各单住的群众心惊肉跳，觉得恶运随时有可能降临。派性冲突也在明中暗中加剧。清查“五·一六”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七〇年3月27日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毛泽东批示：“照办。”通知承认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指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逼、供、信。然而，这个通知是在肯定存在“五·一六”的基础上发出的。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加上所定“五·一六”的罪行范围广泛，因此，“三·二七通知”虽然有企图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但实施中却适得其反。

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全大陆的逼、供、信运动。一些人被隔离审查，受尽折磨。由于清查“五·一六”长达数年，捏造出来的“罪行”反复交待，一些细节则在反复交待中编得神乎其神。“五·一六”被描绘成了一个罪大恶极、无孔不入的组织。

在“五·一六”组织和罪行都不明晰的情况下，在认为必定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秘密组织的基础上，一九七一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吴德担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从此，全大陆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便按照《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继续进行着。

在不足两千人的外交部清出“五·一六”六、七百人。北京以外的地方，情况就更严重了。就全大陆而言，在清查“五·一六”中，直接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受到牵连的人就无法计数了。有一句顺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便反映出清查“五·一六”的广泛性。

军队的“五·一六”是指与三军“冲派”有关联的那部份群众。不仅把“五·一六”与“五·一三事件”连在一起，而且把它和“七·二〇事件”连在一起，点名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操纵“五·一六”。实质上是对黄、吴、叶、李、邱的反对派的冲击，火药味本来就浓的军队，与“五·一六”斗争的火药味当然更浓。

一九七一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受到震动，然而，清查的方向一时并没有动摇。……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

(九) 金春明先生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9 月出版), 是一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可不读的好书。金先生在书中也有一节专论对“五·一六”的清查, 现将其下半部份全文抄在下面:

可是, 在事情已经基本解决之后, 中央为什么又要专门成立专案组, 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清查运动, 依据是什么? 目的又是什么? 本人目前缺乏足够的事实作分析判断的根据。因此, 这里只能对事情经过作一简述。

1968 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当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 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 强迫“坦白交代”, 以制造扩大化; 另一方面, 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分子”并无科学的判定标准, 一般的解释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 “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这两条从原则上讲并不错, 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可以给予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 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 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 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 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极左狂热造反派, 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 情况颇为复杂。在所谓“红色恐怖”下, 有的单位 1 / 3 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1970 年 3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 制止搞逼、供、信和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 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 缩小打击面”。这些本来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 通知又提出: “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 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这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 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 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 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 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 竟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之后, 林彪也成了“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而且名列首位。到 1973 年冬, 身任公安部长、“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并兼管专案办公室的李震, 也自杀身亡了。在下边的清查运动中, 由于大搞逼供, 轻信口供, 专案组负责人被咬为“五一六”分子的事, 也屡有发生。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 自然难以进行下去, 只好不了了之。但是, 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 却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的灾难, 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这样的教训是不应该轻易忘记的。

□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1 期

~~~~~

【五洲震荡】

文化大革命中的外国造反派

• 寒 山 •

中共革命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受到许多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1949 年以后他们当中很多人住在北京, 构成了当时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 外国专家。1966 年, 文革到来时,

这些专家也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运动。

一．外国老太婆要当中国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的照片：毛泽东为一个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太在一本《毛主席语录》上签名。这个外国老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胳膊上戴着一个醒目的红卫兵袖章。老太的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美国著名记者，1947年当中共被迫撤离延安时，她采访过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说了一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大话和空话，赢得了全世界好汉崇拜者的一片喝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从此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就和这句话联系在了一起。共产党定都北京后，斯特朗成了中南海的座上客，长期为北京的外国专家局工作。

一九六五年斯特朗已经八十一岁了，满头白发，但腰干仍然硬朗。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后，她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专家中，她可能是第一个接受红卫兵袖章，表示自己也是造反派的人。这张照片当时传遍了世界，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和青年从毛泽东赐给斯特朗这个西方人的恩泽中大受鼓舞。斯特朗后来加入了红卫兵的队伍，也去大串联，她拄着拐杖走在游行队伍里的另一张照片当时也十分引人注目。

斯特朗并不是唯一的外国在京革命老太太。有个叫露丝·史密斯的英国共产党员，文革前夕来到中国时已经七十一岁，在外文局和新华社工作。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的人民日报在《外国女专家热烈赞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导中引了她的一段话，她说：“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我七十岁时还在中国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生活在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中国，使我感到恢复了青春，充满了活力、信心和热情。”

二．外国专家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文化大革命后两个多月，八月三十一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四个美国专家用化名贴出了一张被称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其中说：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示的这种对外国人的待遇？为什么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是：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是：有高、特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外国造反派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在这种特殊的生活待遇的背后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阴险的全球性反革命大阴谋，如大字报中所说：

1，这是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2，使革命的外国人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意志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张大字报并作了批示，表示只要外国专家愿意，他们可以和中国人民过一样的生活，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使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外国老头老太红卫兵们激动得不能自持。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寒春当时对红卫兵说：现在，我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只用几个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的阴谋诡计砸个稀巴烂！

三．造反，夺权，专家斗专家

这是第一张也是最著名的外国专家大字报。后来很多外国专家纷纷响应，有的甚至以全家的名义写大字报，表示全家老小都革命，都造反。

在这些外国专家“咸与造反”以前，他们的很多孩子看到自己的中国同学可以打老师，骂家长，既威风又痛快，于是也回家对着自己养尊处优的父母大骂：你们这些美国特务！很多家长如坐在热锅上的蚂蚁。现在好了，他们自己也成了造反派。

外国造反派加入文革后，像他们的中国造反派同志一样，也成立了造反组织，拉起了革命大旗。当时名气大一点的外国造反派组织有“白求恩—延安战斗队”和“国际燎原战斗队”等。这些外国造反派在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方面很能别出心裁，有个外国专家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对被打翻在地的刘少奇不但要踏上一只脚，而且要踏上两只脚，一只脚是因为他反对中国革命，另一只脚是因为他反对世界革命。

成为造反派后，这些外国专家也跟著中国造反派起来夺权。最出风头的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悉尼·里敦伯格）。此人出身名门，后来对革命着迷，十七岁就参加政治活动，后来加入美共。一九四七年他在为联合国救济署工作时来到中国，在周恩来介绍下去了延安，从那以后一直为中共工作。一九五三年苏联告诉中共说他是间谍，中共立刻翻脸将他下狱，后来查清他是被冤枉了，关了六年后放了出来。李敦白不愧是中共的外国好娃娃，挨了妈妈一顿重重的板子后，他对中共更依恋了。文革一来，李敦白就坐不住了。忠不忠看行动，他立刻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这些外国造反派成了当时北京文革浪潮中一道色彩缤纷的风景线。中国造反派举行重要集会游行时，都争著把黄发碧眼的洋造反派拉去作点缀，让他们用怪腔怪调的中文念大字报，表态，痛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可以把自己的造反山头 and “国际无产阶级”拉扯到一起。外国造反派的风头引起了最喜欢出风头的江青的不满，有一次她说这是崇洋媚外。

这些外国造反派不但夺权，也在自己的队伍里深挖阶级敌人。路易·艾黎和马海德都是在延安时期就为中共工作的老革命，但他们和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共要人关系密切，因此成了外国专家造反派的靶子。他们揭发这两个人是特务，和国民党暗中有来往，还把路易·艾黎和贺龙一起拍的照片拿出来作为罪证。他们召开批斗会，要求中共对这两个人设立专案组进行审查。

四．中共后娘的板子

这些外国造反派们在文革初期大出风头，但好景不长，当毛泽东把刘少奇整掉，文革的高潮过去后，又轮到把前一阵的造反派放到肉砧板上了。这时，参加文革的外国造反派因其阶级出身和西方背景而成了最理想的牺牲品。

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中，很多外国专家不但被审查，批斗，隔离，也被关押。外国专家的那些中国造反派同志马上变脸，对他们如躲避瘟疫一般。有个外国专家说，当迫不得已要和这些外国专家发生工作联系时，这些中国人“象扔骨头一样把工作扔到我们的桌子上，然后转身就走。”前面提到的那个七十五岁参加中国文革的英国老太太史密斯被认为有间谍嫌疑，只好回了英国。

最滑稽的是，有一个叫莫妮克的法国红色女郎，她的父母在中国工作。这个法国姑娘在六十年代新左派的气氛下长大，对中国革命有一脑子的浪漫幻想，以为文革就是她早思暮想的自由和狂欢的节日，于是千里迢迢从巴黎来到北京参加狂欢，不料却被投入牢房三年，罪名是她把淫秽小说带进了东方的革命圣地。

一九七三年，文革的疯狂随著林彪集团的垮台而失去了势头，这时中共又要利用这些外国专家了。于是，周恩来照例出来充当好人。在那年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宴会上，他对受迫害的外国专家道歉，把他们受的罪一股脑儿都推到林彪的身上。他还以他特有的戏剧性的风格来到一些外国专家面前，和他们拥抱，表示抚慰。周第一个就向坐在他身边的英国老太史密丝道歉，她是周专门派人去英国请回来的。周的表演果然见效。一个美国女专家说：“我个人的遭遇事小，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事大。”另一个外国专家说：“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周要我去坐牢，我也愿意。”有个叫大卫柯鲁克的英国专家被关了三年，出来后摸著坐牢坐出茧来的屁股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

然而，美共老党员、中共的外国老同志、文革中最出风头的李敦白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此时仍然在狱中盼著党给他平反，说一声：孩子，妈妈错打你了。但他造反太积极了，引起了中共的怀疑，周恩来提都没有提他。或许这是中共的惯技，为运动留一段尾巴，表示当初审查批斗和关押这些外国专家的决策虽然有失误，但并不全错，至今还在狱中坐地的李某就是一例。李敦白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被宣布无罪释放。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这些外国专家们又听到了一个令他们无比振奋的喜讯：他们在文革中大大小小说得清说不清的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平反，他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受妈妈的审查了。

对于这些外国造反派来说，似乎可以说，中共后娘的板子虽然下手时辣了一点，但打完后用温暖的巨手一胡撻，那感觉比睡在亲娘怀里更舒坦。

□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八）

• 周孜仁 •

（续上期）

十一，创办《山城战报》

前面说到我调《新重庆报》言论组，还指定我为组长，实际上我一件实际工作都没有干，因为到报社没几天，分管我们的邱远勋就出差了。事后很久才知道是警备区首长让他和熊代富、王绍川（财贸系统的815头头）一起去北京向中央汇报革联会的情况。“言论组”这帮小子在各学校都是些跳得高的造反骨干，这边厢没活干，学校里热闹事情还多呢。于是东一个西一个就都散了。我本来也想就此机会回校去，突然又接到了一项新任务，要我去创办《山城战报》。

决定创办《山城战报》是革联会3月5日会议上决定的。根据我日记的记录，“鉴于如下三个原因”，革联会要求各学校和组织的小报一律停办：“1，机器困难：全市今年印刷毛著任务

大，一切印刷都得开道让路；2，纸张困难；3，《新重庆报》暂不能为革联会大喊大叫，因此按系统归口，只办《山城红卫兵》和《工农兵战报》”。《山城红卫兵》是原来整个大派学生组织的报纸，一直办着的，而《工农兵战报》创刊时怎么又改为了《山城战报》，我就记不起了。反正我是3月8日正式搬进市委大院住宿，开始报纸筹办工作的。《815战报》终刊后，改出《重大815》，作为内部报纸的校内发行。主持人就有前面提到的，如今重庆集邮界名人何国光。

《山城战报》的主持人是总后驻渝办的一位军官，慈眉善眼，为人十分厚道，但估计没办过报，至少缺乏办报经验，更缺乏和造反派打交道的经验，大约也不想为此承担什么责任，因此对我们非常放手，几乎就“垂拱而治”。近读李锐回忆延安整风的文章，说1942年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始整顿《解放日报》，毛泽东认为初期的《解放日报》是一张“不完全的党报”，有时不能很好地贯彻党中央意图，因此解决党报不能闹独立性、不能有自由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是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组成部份之一。”《山城战报》理论上是最高权力机关革联会的喉舌，可革联会的头头从来就没谁来过问过，而派来的军代表就这么个好好先生，我们这帮造反派自然就“草寇作风”依然，像办派性小报那样，自个儿高兴怎么写怎么写，爱骂谁骂谁，想怎么骂怎么骂。几十年后，重读《山城战报》上当年我写那些文章，一副盛气凌人、气势汹汹的口气，动辄把这个打为“右派”，把那个骂为“反革命”，草率得实在有点过份。西师831平反复出后出版的《红岩》报第二十期第三版文章历数革联会罪状，有一条就明确指责“《山城战报》公开宣布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后工二四二红总是右派组织、反动组织”，这些指责确实完全在理。

如果仅从办报技术角度讲，唯一经验丰富的当是《重庆日报》一位老报人：何文伟。何头发卷曲有致，整天都和蔼地微笑着，那神情很容易让人想起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看见他兢兢业业看稿改稿、画版样、定字体、字号，我才知道编报还有那么多学问。还有一位中年人是四川美术学院的版画老师：尹琼。山西人，画报头、画题花、画漫画，标题提字，从来一丝不苟。从二人身上，我发现了许多年轻人的粗燥。余下的报社成员就都是学生了。师专一位李姓文科生，名字已不详，眼镜，很文弱内秀，说话声音频率偏高，有点女人腔，但文笔严谨，颇见功力，战报的几篇短评，如“大江东去”、“小议亮相”、“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唯一的一位女生来自工业学校，文静而勤恳。西南农学院来了一位，叫黄天俊，人亦极端老实。你很难把他们和“造反派”这个词联系起来。同时来自北碚的还有一位，四川外语学院的，也姓黄，叫黄贵。报社所有人员中，唯他的电话最多，每打电话他必先自报家门：“我叫黄贵，我叫黄贵”。他是江浙人，前三音吐得很温柔，而最后那个“贵”字发音却特别响亮，高八度，好似意外爆发出来的。每次听他自报家门，我就要很好笑地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阿Q原来的名字好像就叫阿一“贵”。但是我们都不敢和他开玩笑，因为他从来一本正经，而且一进报社就和我们离心离德：后来果然发现他是砸派观点，他的电话全是在向谁告密，通报革联会内部消息。有一天，日记载，是四月二十四日，大家终于愤怒了，同仇敌忾地将该“奸细”的被子卷起来从楼上扔了下去。《山城战报》当时设在市委大院临街的三楼。原来是市委干部休闲喝茶喝咖啡的地方，下楼，绕出一个地坝，要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去街上检回落物。黄同学怎么去检的？检没检回来？我们就知道了。这位生性腼腆的江浙小生反正再也没有回来过。

报社组建时明确以重大和师专为主。师专除了上面提到的李某，还有一位叫冉隆太，另外一位姓张，自贡人，名字不详了。而重大，是我、刘福和电机系我的同年级同学胡潮正。能和刘福再度共事，我们俩都非常高兴。只是几十年后，他当了贵州省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磷矿的党委书记（好像是正厅级），因为写这篇文章，前不久我兴致勃勃打电话向他咨询一些当年报社的情况，他却非常负责、非常友善地把我劝慰了一番，要我别自找麻烦、再提那些毫无意义的往事：我不便继续为难他了。

报纸是3月14日创刊的。由于有专业人士参加，又在《重庆日报》正而八经的专业印刷

厂印刷，从版面安排、版式、质量、字体多样性、美术水平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份报纸是很有专业水准的。“创刊宣言”《新山城是我们的》是我写的。“宣言”如是宣称自己的办报宗旨：“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宣传员；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誓死捍卫者；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家；我们的《山城战报》，是天不怕、地不怕、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至于办报风格，“宣言”称：“她诞生在这个惊天动地、被‘一月革命’的历史风暴所震撼的年代，她诞生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殊死的鏖战搏击的时刻，严酷的战斗，使她生就了一副英雄相！她没有半点折衷主义的媚骨，也没有一丝虚伪卑微的奴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山城战报》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毫不含糊糊糊，毫不吞吞吐吐！”。

现在重新读来，我们这些新报人是不是幼稚得有点过份呢？在《山城战报》的报头下面，明明写着：“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会主办”，而革联会明明已经宣布自己是“重庆市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最高权力机构说话，观点竟如此偏颇蛮横，这个政权肯定就有点问题了。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在《政治论》一书中谈到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时，有这样一段话：“完善的法律对个人的关系与完善的理性对激情的关系是一样的：那就是协调相互冲突的力量，以避免毁灭并增进整体的力量”历史上的所有政府，实际上都应该是一个调节器。它必然通过政策法令和政治手腕来协调各阶级、阶层、各社会势力、各利益集团的矛盾乃至冲突，使之达到平衡与和谐，让大家都在社会的大蛋糕上分一块食。一个政权机构，怎么能以实力而自负，成天去激化矛盾甚至无事生非，专事制造矛盾呢？革联会一开始就摆出压倒一切的姿态，它的事情注定只会越搞越糟。

关于这一点，我们确实也不能对革联会责备太甚。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说远一些，解放后十七年搞了多少政治运动？近的，从1962年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反修大辩论、到“四清”运动——那怕学雷锋这种教人行善的活动，也偏偏要塞进一个在军营门口以磨剪子为掩护、专事刺探军事情报的阶级敌人！所有这些，不都在无休止地向人们灌输斗争观念，灌输仇恨吗？谁又能得以幸免？

再来看《战报》的文章。仅读看一下《创刊号》的文章标题就行了：“八三一纵队一命呜呼，二四二红总寿终正寝 / 难兄难弟，一样下场 / 交院‘九一五’、河运校‘航锋’等‘反右’干将也纷纷倒戈。”、“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 历史宣判分裂主义者罪大恶极 / 三司驻渝总站十大罪状”。从内容上看，“扫除一切害人虫”标题下介绍“我市公检、法机关的革命造反派，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从二月份以来，先后在中区、北碚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几长寿县等地，召开了十五次公审斗争处理大会，逮捕法办了造反军“前哨支队”“六号门纵队”“千钧棒战斗队”和“燎原815战斗队”“东风野战分团”等八个反动组织中的首恶份子21名，拘捕了这些反动组织中的一批牛鬼蛇神”。仅就报纸的话语系统来看，这哪儿像一个政权机关的报纸呢？完全是地地道道的派别喉舌。

既然对方已经没有还手之力，就轮着胜利者来细细数落了。从第二期起，就开始来大块评论了，现成的样板当然还是六十年代家喻户晓的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九评”。批判对象是砸派带头羊西师831的机关报：《红岩报》。一评曰：“二月黑风从何而来”，刊登于《山城战报》第二期。3月18日出版。二评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叛徒”，刊登于《山城战报》第三期。3月22日出版。三评曰：“评二月黑风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刊登于《山城战报》第四期。3月25日出版。

上面说到的第一篇评论，无非是一些老调重弹，还是说西师831等组织如何反对夺权、反对革联会过程，重点当然还是罗广斌如何如何操纵、如何如何煽动等等。所叙述的事件发生时间也基本上是一月夺权前后。第二篇说砸派出现的历史根源，除了牵强附会地说砸派是保守

派借尸还魂外，还扯到发生的815腹地重庆大学的一桩历史公案，公案的主角叫徐光明。重大八一五时不时提到的所谓“徐派”、“托派”，就是指他。尽管笔者至今未曾与徐谋过面，但从文革一开始，就知道他在重大绝对算得上出道最早的一条好汉。1966年6月18日无线电系驱赶工作组，他是积极分子之一；815事件发生后，还自费去过一次北京。据说他脾气一贯怪异，喜欢独来独往。最有名的例子是某个于文革初期由他同班同学传出来的故事，说1964年他们去铜梁县驻军某部当兵锻炼。那年月“全国学习解放军”，大学生一个个见了军人都如见天人，而徐偏偏独出心裁，对当兵的炊事班长说他想吃麻雀肉，弄得一向均以雷峰同志为楷模的班长只得漫山遍野为他搜寻食品。此外，徐思想超前，这也注定他难觅知音，所以在造反派和保守派进行生死较量的大环境下，他只能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孤孤单单游离于两派之间。徐在1966年11月，就是815正和所谓“保皇四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宣布成立了一个《红岩公社》，因为人数太少，据说就十来个人，而且他那些过于超前的观点，如：“815本身就是不彻底的革命事件”、“九三、四上北京是右倾逃跑”、“砸烂815总团”，实际上，就是向中国社会的修正主义思潮开火”，等等，这些在当时看来全无可操作性的观点，谁会关心呢？《红岩公社》这种绝对少数派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毕业分配前夕，才因一个偶然的、谁都没有料到的原因而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保守派解散后，重大基本上就没有对立派。按照四川省毕业分配办公室的要求——“分办”主任张西挺，一直对成天骂她烂萝卜的重大815耿耿于怀——各高校的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必须由两派人员对等组成。大量的、逍遥了一两年功夫的原“思想兵”、赤卫军同学，政治上正发愁无所依托，分配过程正发愁无人为之议价，于是一夜之间便纷纷参加已经隶属于“反到底”派的《井冈山公社》（即原《红岩公社》）。人马一下子壮大如此，甘守多年寂寞的徐光明肯定是大喜过望的。只是他的高兴没管多久，因为毕业分配一结束，大伙儿便天南地北，各奔前程去也。更何况这些新社员，他们入社时就从来没有关心过815到底右倾不右倾的，他们只关心自己分个好地方。几十年后，平心静气地来回忆，《红岩公社》人数虽少，但都是些精力充沛、敢于与众不同、对自己的信念非常执着的人，在日后的社会经历中，一定事业有成。如电机系的邹世友，因参加815造反后又反815，曾被同学们痛打。还有一位女生，叫吴贵伦，造反也很早，后与815观点不合，和邹等人成立“偏在寒中俏”战斗队，自然也被同窗们痛打。徐光明是不是挨过打不清楚，但他个子小，815的大个子们一遇他就喜欢用手将他的头发摸来弄去，揉得一团糟，而他从不反抗。有亲历者告诉我说，一次看见徐和815的同学辩论，人多势众的815根本就不想和他罗嗦，不知从哪儿弄些稻草就往他头上挂，往他嘴里喂：因为大家说这位“公社社长”一贯喜欢“捞稻草”，他公然也不反抗，真有“大丈夫甘受胯下之辱”的落落大度。二评花很多笔墨提到徐，显然是要为西师831找一个滑稽可笑的思想源头。因为说到反重大815的右倾，徐光明确实比谁都要早。对《红岩》报的三评，则回过头来，是把当时已经身份明确的“叛徒”罗广斌，以及当时已经身份明确的“反革命组织”“六号门”等扯在一起，确认为西师831的社会基础。

从文章的语气看，三篇文章好像都是出自于我的手笔。几十年后，重读这些东西，我还发现一个同样很见鬼的事情——如果我在三文中对《红岩》报的引语无误的话——在《红岩》报1967年的《新年献词》里，莫名其妙有这么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我们的队伍里，机会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而且很能麻痹一部份群众，享有相当的市场。重庆大学的‘红岩’公社就是推销这种货色的经理部。对于这种机会主义的反动思潮，我们千万客气不得，一定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此外，早在《红岩》报第六期（据推算，出版时间应在1966年12月）就批判过，说徐“一边举起左手高喊打倒重庆市委，一边却举起右手大叫要打倒八一五派。这真是毛主席早在四十年代就批判过的戴季陶主义的活标本。”而几乎很快，徐和西师831就握手言欢，跳进同一条战壕了。这该作何解释呢？说他们没有明确的信念吗？说他们缺乏政治智慧吗？说他们不懂得斗争策略吗？都像是，也都像不是。其实，包括831，包括815，我们好像都是某个上帝做出来的政治玩偶，带智能的。软件操作系统的指令全是仇恨，而实用程序的代码却全是一堆随机数。双方一旦打斗起来，就各行其是，乱了套。

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在评论卡夫卡小说世界时说过一段话，对于描绘1967年中国的社会肖像倒有点像：

在此，没有任何事物在世界上有一个确切的位置，没有任何事物具有稳固的、不可分割的轮廓。每一个存在物不是在上升就是在堕落。一切都在自己的邻人或对手交换着特征。那些该寿终正寝的事物都还没有发育成熟；那些早已精疲力竭的生命还仍处在其漫长生涯的开始。在此根本不可能谈论什么秩序和等级。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在神话世界中得到拯救，然而比起这个世界来，神话世界却不知要年轻多少。

“三评”写完就没有再写下去了。不是无话可说了——要想说的废话还很多——而是，全国的形势突然发生了新的变化。大闹怀仁堂的老帅老将们好像已经遭到毛的反击，谭震林首当其冲。对于四川来说，有一个相应的、类似噩耗的传闻：3月16日，王力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会上讲话，说四川翻过来了。3月16日这一天，这句话当然还没有传来。这句话是过了好些日子才传来的。我翻看了我的日记，恰恰也是在那一天，我对革联会开始发生了动摇，这此动摇是如此强烈，延续的时间几乎达一个月，这样说吧：我自己差一点儿也站到对立派的阵营去了。

（未完待续）

~~~~~

【学术探讨】

毛泽东留有遗嘱吗？

• 胡 平 •

许华先生在《北京之春》2001年10月号（总第10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有没有留下遗嘱？”最近从网上刊物《华夏文摘》（zk0204c）读到陈益南先生探讨文革的文章，其中也推测毛泽东应留有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临终遗嘱。

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有趣。众所周知，毛泽东生前对接班人问题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机，为此不惜在党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清洗；然而毛一去世，尸骨未寒，自己的老婆和一班亲信就被打成“反革命”锒铛入狱，那显然不合乎毛本人的意愿。因而人们有理由怀疑毛泽东本来留有一份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遗嘱，对“四人帮”一派有利，但是被华国锋等先下手为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份遗嘱也就被封锁或销毁了。

上述推测固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就接班问题留下遗嘱或密诏。毕竟，毛泽东不是皇帝，他不能通过一纸遗书或密诏确定接班人选。共产党也没有靠领袖遗嘱或密诏确立接班人的先例或传统。例如著名的列宁遗嘱，其中虽然对几位“亲密战友”逐一评判，但并没有明确表示要谁接班的意思。

一般来说，如果独裁者决定用遗嘱的方式确立接班人，那么，他需要让朝野上下一一起码是文武重臣——都知道有这样一份遗嘱的存在，并且对之严加保管；否则，“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从中破坏，在“伟大领袖”死后作乱，或者把遗嘱涂改伪造，或者干脆扣下不发（对外就说没有），那岂不前功尽弃，坏了大事？

我不相信毛留有指定接班人的遗嘱，更重要的理由是，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并不能单独确立自己的继位人选；因为在理论上，领袖的权力不是属于领袖自己（这点和古代

的皇帝有别)，而是属于党。在程序上，毛泽东只能提出某一职位的人选，然后还须经过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通过。这意味着，毛泽东如果想把某人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在生前就完成相应的安排。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这样确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这样确立的。华国锋是由毛亲自提名，再经由政治局通过而出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注意：当时特别强调是“第一”副主席，以拉开和其他副主席的距离）和国务院总理，成为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并保持这种地位直到毛去世，这等于是宣布了华的接班人身份。因此，要说毛的本意只是把华当作一个过渡性人物，另留下遗嘱让“四人帮”掌握大权，并且一直到临终都秘而不宣，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毛在晚年对接班人问题机关算尽，但最终还是失算了；不过也不尽然。如果毛向左派（“四人帮”）一边倒，右派要抗争，只能公开打出“非毛”“反毛”的旗帜，若右派获胜，哪里还会有今天的毛泽东纪念堂？毛让华接班，指望华能平衡左右两派，没想到华与右派联手，利用其正统地位而轻易地打倒了左派。这就应了毛在林彪事件后公布的那封先前写给江青信里的一种预言，右派果然在毛死后闹事，但还是打出毛的旗号。毛的名字竟被利用来作反毛的事，但毛的名字却也因此而得到保护。就这点而言，毛并没有全盘失算；你甚至可以说，以毛犯下的滔天大罪，包括对他的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毛身后的名誉居然还能得到该党的精心保护，他的算计已然是很精明的了。

（ 5 / 7 / 2 0 0 2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